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

輯刊

六編 第十八冊

三蘇史論研究(上)

陳秉貞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六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8 冊

三蘇史論研究（上）

陳 秉 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三蘇史論研究（上）／陳秉貞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4+18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六編；第 18 冊）

ISBN：978-986-254-612-3（精裝）

1.（宋）蘇洵 2.（宋）蘇軾 3.（宋）蘇轍 4.史學評論

618

100015465

ISBN-978-986-254-612-3



9 789862 546123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254-612-3

三蘇史論研究（上）

作 者 陳秉貞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三蘇史論研究（上）

陳秉貞 著

作者簡介

陳秉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台北市立金華國中教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經歷：世新大學中文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教育部國民中學國語文教科圖書審定委員，國立教育資料館國語文領域學習影片製作委員會媒體委員。著作有：《余秋雨散文研究》、《三蘇史論研究》、《情境式創意作文》（合著）、《圍攻錯別字辭典》（合著）等。

提 要

北宋蘇洵（1009-1066）、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父子三人，並稱「三蘇」。三蘇父子不但同時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中，又以豐厚的學養基礎，建構出具有獨特風貌的思想體系。在學術史上，建立了三蘇蜀學，與荊公新學、溫公朔學和二程洛學等各大學派分庭抗禮。三蘇蜀學最常被提到的特色就是對於史學的重視，從各家的評論和三蘇的實際創作表現，都能看出史論在三蘇文章創作中的代表性。本論文在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理論、新歷史主義、形式主義文論和中國文章學等各樣理論的啟發下，以「三蘇史論」作為研究對象。透過直接閱讀三蘇的史論作品，與三蘇進行「對話」，嘗試著去詮釋他們對於歷史的詮釋，並試圖建構出他們藉由史論所要建構的意義。最後得到四點結論：第一，三蘇獨特的成學背景，造就了三蘇史論「博古宜今」的特色。第二，三蘇史論呈現出「重史」、「重人情」、「重通變」、「重調和」的特色，是源自三蘇對於知識傳統的吸收與創造。第三，三蘇史論對於個人和國家的意義建構，是歷史意識與現實態度的密切結合。第四，三蘇史論不但繼承了文學傳統，並且為史論的表現力開創出新的局面。總而言之，三蘇創作了「史論」，「史論」也成就了三蘇。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史論流變概述	3
一、從史學思想方面看	3
(一) 先秦時期	3
(二) 秦漢時代	4
(三) 魏晉南北朝	6
(四) 隋唐五代	8
二、從文學形式方面看	10
(一) 春秋筆法	10
(二) 史書論贊體	12
(三) 議論文體	1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向	16
一、三蘇史論之界定	16
二、研究方向	17
第二章 三蘇史論「詮釋立場」之建立	27
第一節 成學背景與詮釋立場	27
一、以古為師	27
二、廣博涉獵	30
三、務出己見	34
四、適於實用	38
第二節 知識傳統與詮釋立場	41
一、重禮輕法	41
二、明勢通變	48
三、經史互證	54
(一)「經史互證」觀的建立	54
(二)「經史互證」觀的落實	57
(三)「經史互證」觀的延伸發展	66
第三節 時代背景與詮釋立場	69
一、三蘇之求用時期	69
二、蘇軾、蘇轍之任官時期	74
(一) 神宗熙寧年間	75
(二) 哲宗元祐年間	77
三、蘇軾、蘇轍之貶謫時期	80
(一) 神宗元豐年間	80

(二) 哲宗紹聖之後	82
第四節 小 結	86
第三章 三蘇史論之歷史觀	89
第一節 天人關係論	89
一、三蘇對於「天」的概念	91
(一)「天」的概念之一：自然萬物	91
(二)「天」的概念之二：天道	93
二、三蘇對於天人關係的主張	95
第二節 勢 論	99
一、由「天人關係」到「勢」的討論	99
二、三蘇論勢之始：蘇洵〈審勢〉	100
三、三蘇論勢的目的	103
四、「因勢權變」的提出和做法	104
五、「順勢權變」的提出和做法	107
六、「事勢」和「理勢」的涵義	108
第三節 中庸論	110
一、由「勢」到「中庸」的討論	110
二、理想的歷史發展原則	110
三、對「中庸」的定義	112
四、追求中庸的目的	113
五、達到中庸的原則和做法	114
第四節 小 結	118
第四章 三蘇史論之人物論	121
第一節 人性論	121
一、「性」與「道」的關係	122
二、人性本質：「性」的內涵	124
三、人性實踐：「習」的內涵	124
第二節 修養論	126
一、「修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27
二、個人修養的原則和方法	129
(一) 第一個層次：知	129
(二) 第二個層次：守	131
(三) 第三個層次：樂	134
三、個人修養的推擴	136
第三節 人物心理論	137
一、君主	138

(一) 創建方面	138
(二) 守成方面	142
二、大臣	146
三、吏胥	150
第四節 群己關係論	156
一、君與臣的關係	156
(一) 君對待臣	156
(二) 臣對待君	163
二、君與民的關係	169
三、臣與臣的關係	177
第五節 小 結	185
下 冊	
第五章 三蘇史論之政治制度論	187
第一節 政權傳承與分配制度	187
一、正統論	187
(一) 君統傳延	187
(二) 朝代承續	194
二、封建論	202
第二節 財政與經濟制度	208
一、賦役	208
(一) 賦稅	208
(二) 勞役	216
二、商業	222
第三節 軍事與國防制度	228
一、兵制	228
(一) 集兵養兵	229
(二) 用兵任將	237
二、國防外交	245
(一) 歲幣問題	245
(二) 敵情分析	247
(三) 自我建設	250
(四) 對外策略	253
第四節 小 結	260
第六章 三蘇史論之取材與論證方式	263
第一節 三蘇史論的取材	263

一、選取材料的傾向	263
二、材料指涉的典型化	266
(一) 正面人物	267
(二) 爭議性人物	268
(三) 反面人物	270
第二節 三蘇史論的論證方式	272
一、歷代演變	272
二、對比論證	275
(一) 用具體事例論證	275
(二) 用抽象原則論證	277
三、類比論證	280
(一) 以一件歷史事例類比	280
(二) 以多件歷史事例類比	280
四、類比、對比合用	282
五、假設性論證	283
第三節 小 結	289
第七章 三蘇史論之文學美感	291
第一節 「生動」美的形成	291
一、譬喻法	291
二、對話法	299
三、設問法	302
第二節 「凝鍊」美的形成	305
一、概括法	305
二、警策法	309
三、引用法	311
第三節 「氣勢」美的形成	313
一、排比法	314
二、誇張法	319
三、層遞法	323
第四節 小 結	325
第八章 結 論	333
參考書目	343
附表一：〈三蘇史論篇目〉	359
附表二：〈三蘇年譜簡表〉	371
附表三：〈三蘇論歷史人物意見簡表〉	379
附表四：〈三蘇史論意見與特色分布表〉	39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北宋蘇洵（1009～1066）、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父子三人，並稱「三蘇」。三蘇父子以精采的詩文表現，崛起於北宋文壇，並且在文學史上同時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中。他們又以豐厚的學養基礎，傳承發揚傳統的學術文化，建構出具有獨特風貌的思想體系。在學術史上，建立了「三蘇蜀學」，〔註1〕與「荊公新學」、「溫公朔學」和「二程洛學」等各大學派〔註2〕分庭抗禮。身為蘇門四學士的秦觀，曾在〈答傅彬老簡〉文中說：

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註3〕

〔註1〕這裡所說的「蜀學」，是指狹義的蜀學，或稱「三蘇蜀學」，即由蘇洵開創，由蘇軾、蘇轍兄弟發展成熟，由張耒、秦觀、黃庭堅、晁補之等文人學士為羽翼的有較為一致的學術傾向的學派，而不是指廣義的以兩宋蜀地的眾多學術家族和學者為主體的蜀學。參考冷成金所下的定義，見〈試論「三蘇」蜀學的思想特徵〉，福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72。

〔註2〕漆俠說：「宋仁宗晚年（嘉祐）到宋神宗初是宋學的大發展階段，形成為各具特色的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學派和以洛（二程）關（張載）為代表的理學派等四大學派。」見〈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濟南：《文史哲》1995年第1期，頁5。

〔註3〕秦觀：〈答傅彬老簡〉，《淮海集·卷三十》（四部叢刊正編·集部，臺北：臺

秦觀的話確實提醒了我們：論三蘇蜀學不可僅止於文章。但不可否認的，若非有卓越的文章創作，三蘇蜀學也無法在北宋獲得如此快速的傳播。

論及「三蘇蜀學」的特色，最常被提到的一點就是對於「史學」的重視。這一特點，自蘇洵起就已呈現。蘇洵重視對古今治亂成敗的探討，希望以史為鑑，其著作中亦頗多史論文字。雷簡夫看了蘇洵的文章之後，稱讚說：

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之才；〈史論〉得史遷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之心。〔註4〕

這是強調蘇洵博古知今，以史論世，足具輔弼之才，所展現的文章功力足以傲視群倫。歐陽脩也稱讚蘇洵：

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註5〕

蘇氏兄弟稟承家學，特別注意對古今治亂盛衰的探討。蘇軾在〈上韓太尉書〉中說：「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註6〕因此蘇軾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論。蘇轍〈歷代論引〉也說：「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註7〕他自己所寫作的史論數量，更是三蘇當中最多的。不論是他人推薦或是三蘇自述，這些話都指出了「史論」在三蘇文章創作中的代表性。

身為三蘇史論的讀者，總是為他們出人意表的見識和精妙的文辭所折服，同時也不禁產生許多疑問：到底三蘇是如何「博於古」？他們確實涉獵了哪些典籍？他們閱讀的方式和閱讀的過程對於他們寫作史論又有何影響？三蘇的史論是如何「宜於今」？他們討論了哪些宜今之事？又是否真的「宜今」呢？三蘇史論中的「古」、「今」的成分是如何分配的？他們用來「以古證今」、「以史論世」的論證方式為何？三蘇「能文」的長處，如何發揮在史論的寫作上？又對史論的意義生成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1月臺一版），頁106。

〔註4〕 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李劍雄、劉德權點校），卷15，頁118～119。

〔註5〕 歐陽脩：〈薦布衣蘇洵狀〉，《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一刷），第6冊，頁280。

〔註6〕 蘇軾：〈上韓太尉書〉，《蘇軾文集卷四十八》，頁1381。

〔註7〕 蘇轍：〈歷代論引〉，《蘇轍集·樂城後集卷七》，頁958。

但是在眾多對於三蘇的個別研究中，往往少見針對「史論」的探討，〔註 8〕更未見以「三蘇史論」為對象的研究。而且許多研究三蘇散文的研究者，往往只是重複羅列歷代古文評點中對於三蘇文章的相關評語，讓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致於我們對於「三蘇史論」的了解，一直停留在極為浮泛的表層。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因此決定以「三蘇史論」作為研究對象。透過直接閱讀三蘇的史論作品，與三蘇進行「對話」，嘗試著去詮釋他們對於歷史的詮釋，並試圖建構出他們藉由「史論」所要建構的意義。

第二節 史論流變概述

所謂史論，就是讀史者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以及歷史發展過程所發表的評論。因此從內容來說，是讀史者對於「歷史」的看法；從形式上來說，是讀史者用「議論文體」寫成的文章，以求明白適切地傳達自己的見解。也可以說，「史論」就是史學思想與文學形式的結合。

一、從史學思想方面看

（一）先秦時期

歷史評論的產生，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人們創造出曆法和文字，一是人們歷史意識的發展。有了曆法和文字，人們才能有秩序地記事，並使其得以保存和流傳；而人們的歷史意識的發展，則使得歷史評論的不斷豐富成為可能。

中國最早的歷史評論，應該是周人所謂的「殷鑑」。從《尚書》和《詩經》中，都能看到歷史鑑戒的思想，如《尚書·召誥》：「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詩經·文王》：「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鑑於殷，駿命不易。」周人是由殷的滅亡和周的代興，得出要以「明德」來取得「皇天」信任的結論。也就是說，周人是用「德」來結合「天命」，從而使人間現實的秩序不發生變化。

〔註 8〕 僅見三本碩士論文，即謝敏玲：《蘇軾史論散文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吳淑樺：《蘇轍史論散文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論文，2002 年）和郭宗南：《蘇轍史論文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隨著社會的變遷，到了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活躍，大國爭霸，戰爭頻仍。在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於指陳歷史形勢，對歷史趨勢作出判斷，顯示出了相當深刻的歷史見解。而孔子作《春秋》，是最早在歷史撰述上明確提出「義」的要求的。〔註9〕誠如劉知幾《史通》所說：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註10〕

孔子《春秋》因舊史之文，說一代之事，從而寄託褒貶是非之「義」，在這當中所呈現出最主要的歷史評論觀念，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周禮及周禮所規定的等級秩序；重人事，就是著重評論了春秋時期的政治、軍事活動及其得失成敗。這種對於「人事」、「人道」的注重，還可以從《國語》、《左傳》、《禮記》中，找到許多記錄。這樣的觀念，代表在當時「天命」史觀籠罩下的人們開始自覺地對自身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行思考，進而認為「人」是歷史發展中的關鍵角色。

春秋以後迄於漢初，是一個史學氣氛瀰漫的時代。先秦諸子競以歷史作根據，建立其學說。例如孟子論及「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及歷史一治一亂的循環，就是思想與史實的結合。一般士大夫也與歷史結緣，發言立論，咸以歷史爲依歸。春秋時代士大夫據歷史發揮其言論的情況，可從《左傳》書中所載看出。〔註11〕而戰國時代的策士馳騁議論，則可由《戰國策》中看出其對歷史的評論與應用。

（二）秦漢時代

西漢初年，新的封建統一政權剛剛建立，必須解決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所面臨的種種矛盾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許多具有遠見卓識

〔註9〕《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3月），頁295。

〔註10〕劉知幾：《史通》，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10月），頁7。

〔註11〕實際的例子可參見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11月），第1冊，頁150～154。

的思想家應運而生，寫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史論，如陸賈《新語》、賈誼〈過秦論〉、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等。他們以歷史的宏觀角度來觀察秦亡的教訓，作出精確的總結，以之運籌新興政權應取的治國方略，謀畫解決經濟上凋敝、政治上藩國割據勢力膨脹的方法。也就是說，漢初的史論與時代息息相關，反映了時代的需要，推動了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這一歷史地位應該得到肯定。

漢初史論在回答時代所提出的課題的同時，也為《史記》的產生準備了條件。因為從陸賈到司馬談的史論，已在總結歷史變化，提出加強中央集權的等級制理論，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以及在學術思想上兼采各家學說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言論。再加上先秦史學的積累，武帝時代的盛世和司馬遷本身的經歷和才能，產生了《史記》這一偉大的史學成果。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曾概括說明了《史記》在歷史評論上所秉持的最主要的思想：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註12〕

司馬遷講「究天人之際」，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不會干預人事的運作，是「人」自己要擔負起在歷史發展上的重要作用，也要自己承擔行事的成敗得失。而司馬遷所看重的「人」，不只是君主，還包含了「輔弼股肱之臣」和「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之人。這樣的觀點，與同時期的董仲舒所強調「跡之於古，返之於天」〔註13〕的歷史觀是對立的。至於「通古今之變」則是對於歷史演進過程的掌握（通古今），並且在「通古今」的基礎上闡述歷史的變化，以及從歷史變化中指出歷史的進化。例如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是認為禮本身就是適應古今形勢變化而制訂的；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註14〕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是在政治極盛時就可以洞見其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思想，是對先秦時期的「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註12〕《漢書·司馬遷傳第三十二》，《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第4冊，頁2735。

〔註13〕《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3冊，頁2520。

〔註14〕《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9月），頁1380。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註15〕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而與董仲舒宣揚的「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註16〕的思想相對立。

班固《漢書》的寫作背景和《史記》不太相同，所以《漢書》史論所呈現的思想重點也有所不同，班固特別凸顯的是「皇朝意識」和「正宗思想」。班固的皇朝意識，呈現在他非常自覺地歌頌漢皇朝的功業和它存在的合理性。〔註17〕而他的正宗思想也與皇朝意識有密切的聯繫，其主要表現，一是對「天命」的著力渲染，認為劉邦和劉秀都是因得「天命」而致帝位的；一是為了要證明漢皇朝是得「天下正統」，不得不對歷史聯繫採取迴避的態度，例如在許多論述中不承認秦朝的歷史功績，或者淡化項羽的歷史作用，也迴避處理新莽政權的歷史等。但因為合乎封建皇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班固《漢書》乃成為歷代紀傳體皇朝史的楷模，也是「正史」格局形成的標誌。

（三）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視野開闊，撰述多途，除記一代皇朝之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傳、域外史、史論、史注等許多方面，都有豐碩的成果，顯示出史學多途發展的盎然生機。〔註18〕正史的歷史評論，可以范曄的《後漢書》為代表。首先，他對東漢時期的政治得失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得眾心」、「結於人心深矣」對於政治上的成功極為重要。其次，范曄的人才論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他認為一是要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盡其用，「英能承風，俊乂咸事」。

〔註15〕《周易·繫辭下》，《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三刷），頁167。

〔註16〕《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3冊，頁2518～2519。

〔註17〕如班固在《漢書·高帝紀第一·贊》中，為證明「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具有歷史根據，首先引證春秋時晉史官蔡墨的話說：「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接著引證晉大夫范宣子的話說：「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同時指出：「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最後引證劉向和周市的話，說戰國時劉氏居於魏；魏滅，遷大梁，居於豐，「豐公」即「太上皇父」。於是班固說：「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1冊，頁81～82）如此班彪在《王命論》中說的：「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這些話，便都從歷史上得到「證明」了。

〔註18〕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9月），頁221。

根據這一認識，他對東漢順帝時的人才輩出，讚嘆不已，而對桓帝時的人才政策則覺「可為恨哉」。^{〔註19〕}第三，范曄對於佛教、方術、讖緯等，都採取批評的態度。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到了，也是採取保留的態度。第四，范曄的歷史評論，則顯示出他對東漢時期學術史的興趣和見解。此外，他對於歷史人物的看法是取兼容態度的，並不持偏激之見。他推崇忠義，進取的人生，但也承認「性尚分流，為否異適」^{〔註20〕}的歷史現象。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思想也突出地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因朝代更迭的頻繁，而促使人們的「興亡」之辯；因佛教的盛行而引起人們對「神滅不滅」的論難；因取士制度的需要，而推動人們對於「品評人物」的關注。這些可說都是當時歷史評論的重要課題。

朝代興亡，始終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關注的重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面對政治動蕩，社會矛盾尖銳，朝代驟興驟亡的現實，興亡問題再次為人們所關注。針對這個問題思考，而提出見解的有三國魏曹叅〈六代論〉、西晉陸機〈辯亡論〉和〈五等論〉。其核心思想都是極言秦、漢不尊古制之弊，認為「分封制」是「治」的保證，「郡縣制」是「亂」的根源。這樣的見解雖然不算高明，後世也因此有不同的主張產生，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對推人們關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和認識，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隨著佛教的發展，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都有所影響。反映在歷史評論上，則是「神滅」與「神不滅」的論辯。支持「神滅」論的是范曄和范縝，范曄的觀點呈現在《後漢書》的史論中，而范縝則是寫了〈神滅論〉。支持「神不滅」論的是沈約，他在梁武帝發動「王公朝貴」撰文圍攻范縝時，連續寫出了〈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等文。^{〔註21〕}他所寫的《宋書》也有宣揚天命、佛教和預言的特色，甚至有過於穿鑿附會而近於荒誕的言論產生。^{〔註22〕}

〔註19〕 見《後漢書·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第3冊，頁2043。

〔註20〕 《後漢書·獨行列傳第七十一·序》，《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4冊，頁2665。

〔註21〕 見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3月），卷二十八、二十九。

〔註22〕 例如沈約在《宋書·符瑞志第十七上》篇末發論說：「史臣謹按，冀州道人法稱所云玉璧三十二枚者，宋氏卜世之數者，蓋卜年之數也。謂卜世者，謬其言耳。三十二者，二三十，則六十矣。宋氏受命至於禪齊，凡六十年云。」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九品官人法」，一方面是「名節」、「家風」的提倡，一方面也是選官任史的要求，使得「品評人物」成為當時社會風氣的重要特點之一，也推動了品評人物理論的發展。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一是三國時魏人劉邵〔註23〕所著《人物志》，一是前面已經提及的范曄《後漢書》的人物評論。《人物志》是一部品評人物的理論著作，一般不結合具體的歷史人物進行，只有個別的篇章（如〈流業〉）採取了列舉人物的表述方法。但是它是第一次從理論上有系統地分析了歷史活動中的主體在才性上的種種差異，以及認識這種差異的社會實踐意義，宋人阮逸稱它：「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繁括，其效不為小矣。」〔註24〕

（四）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時期，史學在繼續發展中出現了新的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私人修史受到限制，皇家加強了對修史的控制，並設立了專門的修史機構——史館，完善了相應的史官制度，官修史書成績斐然。第二個轉折，是史學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逐步擺脫經學的羈絆而卓然自立，也獲得了社會的承認，這反映在文獻整理和科舉考試方面特別突出。第三個轉折，是出現了對史學工作進行總結的專書，史學批評趨於成熟，標誌著史學發展進入了更加自覺的階段。第四個轉折，是在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長期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典制體史書這一新的表現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史學家的重視，從而豐富了史學的內涵，擴大了歷史撰述的領域。還有一個轉折，是通史撰述出現了復興的趨勢和歷史筆記開始發展起來。〔註25〕至於在歷史評論方面的發展，則突出反映在關於治國的理論、關於君主的理論和關於「封建」的理論等方面。

唐朝初年，有許多關於探討歷代興亡成敗原因和提出治國方略的史論，在北宋李昉等所編的《文苑英華》中有三卷為「興亡」論，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論述。〔註26〕可看出這個論題被關注的程度。其中討論隋之滅亡原因具有代

見《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7月六版），第1冊，頁786。把「三十二」說成「二三十」，再說成「六十」，以證明法稱預言宋祚的正確，實在是很牽強。

〔註23〕 劉邵，《三國志》作劉劭，今從《隋書·經籍志》及《人物志》所署。

〔註24〕 見劉邵：《人物志·書首阮逸序》（四部叢刊正編·子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1月臺一版），頁2。

〔註25〕 參考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9月），頁283。

〔註26〕 如隋盧思道〈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李德林〈大命論〉；唐朱敬則〈魏